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总 编 委 会

顾 问 戴 逸 金 冲 及 丁 伟 志
李 侃 郑 惠 徐 宗 勉

主 编 刘国新 刘 晓 贺耀敏

副主编 武 力 杨凤城 戴国庆 刘占昌

编 委	钟真真	毛仲伟	王树荫	何虎生
	林 嘉	夏 潮	安建设	李松林
	陈思训	魏新生	潘 扬	吕 微
	彭 卫	于剑波	朱立南	包 仁
	孔繁顺	刘占义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温六零 彭庆国

责任校对 马丕环

版式设计 钟 莉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第 二 卷

主编 刘 晓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75

字数 775 千字

版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219—02787—7/K·330

本册定价 50 元

(全套定价 268 元)

第二卷

(1957 — 1965)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卷 编委会

主 编	刘 晓			
副主编	王树荫	何虎生	杨凤城	
编 委	王进伟	齐鹏飞	陈 岳	胡明华
作 者	孙从远	黄 伟	冯毓奎	刘国新
	刘 晶	黄军衔	里 凡	钟真真
	刘 晓	夏 潮	齐鹏飞	王 进
	金鸣娟	曹希龄	沈谦芳	王 炎
	林 嘉	陈 岳	杨凤城	王树荫
	倪晓华	张国雄	李 英	王 虹
	胡明华	母稷祥	何虎生	许士荣
	张国友	何政兵	柴观珍	沈红霞
	江秀平	肖艳莉	赵海松	武 力
	史君红	蒲 传	刘占义	赵 旭

前言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都没有离开过这个题目,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逐渐积淀下一些想法,想法多了,又逐渐升华为一个愿望,这就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的初衷。

共和国史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个魅力就在于当代社会的有机性和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造就了当代中国历史舞台跌宕起伏的剧情,历史事件的峰回路转,历史人物角色命运的大起大落,常令一些普适的方法和原理遇到挑战,这都不是维像的图描和直观的线性因果分析所能完全解答的。当代社会的高科技、信息化和系统性使各门学科和各种知识日趋整体化,只注意一点,会失之片面,只熟知某一方面,也会流于偏颇。研究者要想迸发创造的火花,就必须脱离偏重政治史的窠臼,学会观察和评判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要有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以及较强的思辨性。共和国史的魅力还在于它有更直接的借鉴作用和警世功能。相对于其他断代史,共和国史同现实

社会的联系更紧密。当我们需要从事实向理论过渡,总结历史经验时,就会发现所直面的事实,往往还是清晰的,尚未蒙上岁月的风尘,揭示其真谛,减免了许多曲折。尤其重要的是,这段历史时限内曾经发生的事与正在进行的事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阶段性可能结束了,过程则仍在继续。在这里,“前事不忘”是人们脑海中鲜明的印象,它没有做作和掩饰,没有人为的编造和雕琢,因而,才能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后事之师”。

共和国的魅力当不止这些。如果说既往历史像风平浪静的港湾,那么共和国史就好比波澜壮阔的海洋,它的深邃和广博吸引你去扬帆踏浪。这正是以共和国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近年呈洋洋大观之势的重要原因。

如何既再现共和国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又不与已经出版的各种史著雷同?这个问题曾长时间萦绕在心头。苦思之后,还是从前人的遗产如《史记》,如《资治通鉴》等中获得一点感悟,从而设计出现在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各卷统一分为

总论、重大事件、人物、大事记及文献资料五部分。

“总论”为各卷之首，从宏观上勾画本时期历史概貌及其发展阶段，侧重于纵向叙述，其中也包括对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的概括及总结。以期使读者获得一个总体的框架式的印象。

“重大事件”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和史学的叙事功能，侧重于历史的横断面。每一事件独立成篇，力求完整地揭示其发生、发展及结局。这些事件都是历史的关节点，它们一个一个相连，就构成共和国史的脉络。在编排上，大体依时间先后为序。

“人物”是吸收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突出作用的人物和英雄模范立传，这是通过人的活动从另一侧面再现历史和透视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一种尝试。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卫生、民族、国土、人口等林林总总的事为纬，编织出一幅细密的网络。

“文献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及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总目和文献资料要目。

总之，主旨是使本书既有宏观的概括（如“总论”）、又有中观的叙事（如“重大事件”），还有微观的记录（如“大事记”）；既有原始资料供参考，又有研究成果备索引，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现共和国历史风貌。当然，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是否实现了作者的意图尚望读者裁定。如果读者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那也是各位作者努力的结果。顺便指出，本书的

4卷依次为：1949——1956年为第一卷；1956——1966年为第二卷；1966——1976年为第三卷；1976——1994年为第四卷。这种划分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各种版本的共和国史著都因袭此制，本书亦不例外。

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们感到没有同行学者的丰富积累和当代资料出版事业的发达，完成此书是不可想象的。本书引用了国内外不少研究成果，其中能确切指明资料或观点出处的，均尽可能在脚注中说明，以便利读者进一步研究。我代表作者对本书所引用到的有名或无名作者深表谢忱。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这一学科中的很多专家和老一辈学者曾给予热情的关注和极大的帮助，部分手稿承蒙有关专家审阅，戴逸、金冲及、丁伟志、李侃、郑惠、徐宗勉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此，全体作者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当此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图书出版受到严峻挑战之际，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能够不为功利所趋使，斥重资出版此书，这种扶持学术的魄力和着眼于长远文化建设的良苦用心，令人崇敬。夏永翔、区向明、欧薇薇、温六零等同志更为本书付出辛勤的劳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此书只好暂时搁浅了。

刘国新

1993年4月于北京小石橋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第二卷)

目 录

前言 (1)

总论 (1)

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1)

一、八大前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道路的探索 (1)二、大跃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的道路的挫折 (5)三、从纠“左”到“反右倾”的庐山
会议 (7)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 (8)

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十年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0)

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 (12)

重大事件 (17)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7)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的提出 (17)

二、开门整风 (19)

三、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 (21)

四、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
..... (22)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 (23)一、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
运动的发动 (23)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
运动的成绩和经验 (24)

两种教育制度的提出与实施 (25)

一、两种教育制度的酝酿 (25)

二、两种教育制度的正式提出 (27)

三、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和曲折
..... (28)四、刘少奇再次提出两种教育制
度及其新高潮的出现 (29)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32)

一、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32)

二、人民公社化的提出 (33)

三、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34)

四、狂热的大炼钢铁与全国公社
化 (36)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与反教条
主义斗争 (37)一、军队的正规化和检查与纠正
教条主义倾向 (37)二、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工
作的不同看法 (38)三、军委扩大会激烈批判“教条主
义” (39)中苏两国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
队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40)

一、在长波电台上的争执 (40)

二、关于共同潜艇舰队的斗争 … (40)	一、以调整和纠“左”为会议的开端 …… (60)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与炮击金门 …… (42)	二、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 (61)
一、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国的策略 …… (42)	三、毛泽东转而批右倾机会主义 …… (62)
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炮击金门的准备 …… (43)	四、会议的决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展开 …… (62)
三、万炮齐轰金门岛 …… (43)	赫鲁晓夫访华 …… (63)
四、严密封锁金门,切断孤岛补援 …… (44)	最高人民法院特赦战争罪犯 …… (65)
五、美蒋矛盾的发展与毛泽东的决策 …… (46)	一、十周年大庆第一次特赦战犯 …… (65)
第一次郑州会议与八届六中全会 …… (47)	二、对在押战犯的陆续特赦 …… (66)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 (47)	大庆石油勘探大会战与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兴起 …… (67)
二、武昌会议进一步试图纠正“共产风” …… (48)	一、大庆油田的发现 …… (67)
三、中共第八届六中全会 …… (49)	二、石油勘探大会战 …… (68)
第二次郑州会议与八届七中全会 …… (50)	三、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兴起 …… (69)
一、第二次郑州会议 …… (50)	布加勒斯特会议与中苏分歧的扩大 …… (70)
二、上海会议 …… (51)	一、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与中共中央代表的发言 …… (70)
三、中共第八届七中全会 …… (52)	二、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的斗争 …… (70)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53)	三、中苏关系的恶化 …… (71)
一、二届人大工作概况 …… (53)	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 (73)
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 (53)	一、林彪大搞个人崇拜 …… (73)
三、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 (55)	二、对谭政和总政治部的批判与会议的两个决议 …… (73)
四、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 …… (56)	文艺界调整的北京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 …… (74)
五、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 (56)	一、北京会议的和煦暖风 …… (74)
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会议 …… (58)	二、广州会议与周恩来、陈毅的讲话 …… (75)
一、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 (58)	三、大连会议 …… (76)
二、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 …… (59)	各条战线调整政策的出台 …… (76)
三、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 …… (59)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76)
四、第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 …… (60)	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制定 …… (77)
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机会主义 …… (60)	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 (79)
	四、《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的制定 …… (80)

五、《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制定	(80)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	(100)
六、教育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81)	一、解放军突出政治与思想政治工作	(100)
七、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82)	二、工交战线开展学习解放军运动	(100)
八、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82)	三、毛泽东的支持和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展开	(100)
七千人大会	(83)	全军大比武活动	(101)
一、中国共产党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	(83)	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101)
二、讨论与修改刘少奇的书面对报告	(83)	二、全军大比武	(102)
三、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和大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85)	三、林彪的批评与压制	(103)
新疆伊犁反革命暴乱事件	(87)	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与爆炸成功	(103)
一、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87)	一、中国核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104)
二、中国政府的抗议与中苏交涉	(87)	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105)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88)	三、中国政府的立场	(105)
一、调整工作的新进展	(88)	杭州会议与《前十条》	(106)
二、北戴河工作会议	(89)	一、杭州会议与毛泽东的看法	(106)
三、阶级斗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90)	二、《前十条》的主要内容	(106)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91)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四清运动	(108)
一、麦克马洪线与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91)	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提出与试点	(108)
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92)	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	(108)
三、印度当局发动进攻和我边防军的反击	(92)	三、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与转入“四清”运动	(110)
国防战略的变化与“大三线”建设	(94)	全国工作会议与《二十三条》	(111)
一、国防战略的变化	(94)	一、讨论社教问题的全国工作会议	(111)
二、三线建设的确定	(94)	二、《二十三条》的主要内容	(112)
三、三线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96)	三、《二十三条》的影响	(113)
农业学大寨运动	(96)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13)
一、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变生产条件	(96)	西藏自治区成立	(115)
二、山西省学习大寨与学习陈永贵的活动	(96)	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工作	(115)
三、学大寨运动在全国的开展	(97)	二、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	(117)
向雷锋学习运动	(98)	李宗仁回到北京	(118)
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98)	一、李宗仁政治立场的转变	(118)
二、学雷锋运动的开展	(98)	二、程思远牵线搭桥	(118)
三、学习雷锋运动的成效	(99)	三、李宗仁海外归来和在首都机场的声明	(119)

广泛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活动的开展	(120)
一、学习欧阳海	(120)
二、学习谢臣	(121)
三、学习王杰	(121)
四、学习赵尔春	(121)
五、学习吴兴春	(122)
六、学习孙乐义	(122)
七、学习麦贤得	(1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	
外交	(123)
一、中美之间的会谈与斗争	(123)
二、中苏关系从友好合作到严重恶化	(125)
三、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	(126)
四、中国和邻国的睦邻关系	(127)
五、中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	(128)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	(129)
一、工交建设主要成就	(129)
二、农林水利建设重要成就	(134)
三、轻工、化工与电子产业主要成就	(134)
四、首都“十大建筑”	(137)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卫生与体育事业的主要成就	(139)
一、文化卫生事业主要成就	(139)
二、体育事业主要成就	(142)
重大事件(台湾)	(148)
经济建设计划与财经改进措施	(148)
一、第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48)
二、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48)
三、第四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49)
四、“19点财经改进措施”	(149)
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50)
一、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50)
二、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50)
“五二四”反美运动	(151)
一、刘自然事件	(151)

二、群众性的反美浪潮	(151)
雷震事件与《文星》事件	(152)
一、《自由中国》与雷震事件	(152)
二、《文星》事件	(153)
“台独运动”阴霾初起	(154)
一、廖文毅在日本的“台独”活动	(154)
二、苏东启事件与廖启川事件	(154)
三、彭明敏事件	(155)
人物	(157)
于右任	(157)
王杰	(157)
龙云	(158)
齐白石	(158)
向秀丽	(159)
刘文学	(160)
许世英	(160)
李济深	(161)
吴忠信	(162)
俞鸿钧	(163)
沈钧儒	(163)
陈诚	(164)
陈赓	(165)
陈叔通	(166)
陈铭枢	(166)
陈嘉庚	(167)
邵式平	(168)
林伯渠	(169)
欧阳海	(171)
罗荣桓	(172)
柯庆施	(173)
柳亚子	(174)
胡适	(175)
胡宗南	(175)
洪兰友	(176)
徐傅霖	(177)
黄炎培	(177)
梅兰芳	(179)
梅贻琦	(179)
章宗祥	(180)
焦裕禄	(181)
蒋廷黻	(182)
雷锋	(183)

大事记	(185)
1957 年	(185)
1958 年	(205)
1959 年	(217)
1960 年	(229)
1961 年	(243)
1962 年	(259)
1963 年	(273)
1964 年	(285)
1965 年	(308)
大事记(台湾)	(330)
1957 年	(330)
1958 年	(331)
1959 年	(333)
1960 年	(334)
1961 年	(335)
1962 年	(337)
1963 年	(338)
1964 年	(339)
1965 年	(340)
文献资料	(343)
一、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级组织沿革和领导成员名录	(343)
(一) 中央	(34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343)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34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373)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383)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	(383)
中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	(385)
人民团体	(387)
(二) 各省、市、自治区	(388)
北京市	(388)

天津市	(390)
河北省	(391)
山西省	(392)
内蒙古自治区	(393)
辽宁省	(394)
吉林省	(395)
黑龙江省	(396)
上海市	(396)
江苏省	(397)
浙江省	(398)
安徽省	(398)
福建省	(399)
江西省	(400)
山东省	(401)
河南省	(401)
湖北省	(402)
湖南省	(403)
广东省	(403)
广西壮族自治区	(404)
海南行政区	(405)
四川省	(405)
贵州省	(406)
云南省	(406)
西藏自治区	(407)
陕西省	(408)
甘肃省	(409)
青海省	(4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4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12)
二、研究成果	(413)
(一) 论文	(413)
(二) 著作、工具书	(418)
三、文献索引	(424)
(一) 政治	(424)
(二) 经济	(427)
(三) 科教文卫	(429)
(四) 军事	(430)
(五) 外交	(431)

总 论

一

在探索中曲折 发展的十年

从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 1965 年底“文化大革命”爆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国家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的失误;有很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八大前后建设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党和国家也就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新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建国之初,国家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为自己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经验,又缺乏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必然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仰慕、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学习苏联”,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建国初年的学习苏联,也引起相当的

负面作用。如在学习苏联口号下,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在政治宣传上,过多地宣传苏联“老大哥”,片面地宣传苏联的成就,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无益于对苏联经验的批判性的吸收,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场合,甚至将苏联经验奉为神圣,不容怀疑与讨论。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时代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的转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暴露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同时也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新的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从1956年开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比较多地注意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开始,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这个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

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开始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接着,毛泽东也找了34个部委听取了汇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也听取了汇报。1956年4月开始,又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在此期间,工业、交通部门的900个重要的工厂和建设工地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大规模地听取汇报、进行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总结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几次会议,对汇报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归纳,概括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

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由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而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政治局赞同后,毛泽东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式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就是“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谈的是经济问题,前三条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而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轻视农业而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今后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过去因朝鲜战争和国际局势的紧张,对沿海工业重视不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用沿海新建工业更多更快地积累,才能更有力地支持内地工业。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上,毛泽东说,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应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多搞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开辟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讲话的第四、第五条,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第六条是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指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

坚持两点论,我们的方针是,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照搬。这些都涉及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探索,在党内和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认为,在我们还不能普遍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扩大民主的办法,一是使人大代表经常接触人民;二是把人民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是错的对的都发表出来,这有利于揭露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三是使人民代表检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长期任务及其近期扩大的办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展示出一大批探索的成果,其中主要的有这样几点:

(一) 关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

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突出了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正确路线的政治基础。

(二)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就近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强调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认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

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意见对于克服社会主义高潮中给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病和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三) 在国家工作方面,规定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这个方面,董必武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

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写出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董必武还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四)党的工作。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要求重视党内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大会提出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行为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议中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都富有创新精神,对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八大一次会议后,进一步的探索和对八大精神的落实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按照八大的方针,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和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二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对1957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当时出现了重要的争论。毛泽东认为,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等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的预算指标应当压低一点。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会的赞成。毛泽东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成为批判反冒进的由来之一。

在全党整风问题上,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6年秋冬,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紧张,导致一些地方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活跃,出现了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对党和政府工作、干部作风等问题上的批评。这些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新的问题,全党整风,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對抗性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认为,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个新的成果,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并且提出了“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全党整风,揭露和检查、纠正各个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方式和扩大民主形式的重大举措,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在对政治形势的估计的错误和由此采取的错误的政策,使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回流,并且导致在理论上的失误,“左”的错误思想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影响越来越大。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党政机构和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意见,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许多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制度发动了进攻,企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在整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被不适当地夸大了,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改变了运动的主题,将揭露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毛泽东还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允许发表错误言论,暂不加批驳,以暴露右派的面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在全国范围展开。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右派确实存在,但毕竟是极少数,多数人在党的号召下提意见,出自真心,出于善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反右斗争大大扩大了,许多批评意见都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断定,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这样就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一大批党内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打击。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在这个斗争中采取的“引蛇出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划定右派的“热处理”、长官意志等等,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将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引入了一个不正常的轨道。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打断了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基本论断,到八大二次会议,则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

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会议还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

这样,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成为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二

“大跃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挫折

反右派运动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开始探索的正确方面,大跃进运动则是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引向了歧路。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稳定前进,还是不顾条件地加快速度,在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1956年初,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的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现象,引起经济的失调和人民生活的紧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为制止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作了很大努力,八大一次会议正确地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八大以后,周恩来、陈云进一步领导了纠正冒进倾向的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主张,就是纠正冒进的一个结果。这个指导方针的确立,保证了1957年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是不赞同的。毛泽东一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能够调动起来,就能够创造人间的奇迹,他常常将对客观制约条件的考虑与“右倾”“保守”联系起来,将人的意志摆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1957年经

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虽然是由对发展速度的适当控制而来,但毛泽东并不承认这一点,反而由此得出相反结论,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

1957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认为必须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他希望避开苏联走过的弯路,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三中全会以后,八大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发展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高指标、高速度的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反冒进,指责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认为这是政治方向的结论。毛泽东还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认为它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对反冒进的连续的和严厉的批评中,毛泽东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方针,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反冒进和跃进方针的提出,与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有关联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批评过去的经济工作是教条主义,认为是在外国经验的压力下,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在这里混淆了吸取外国经验与教条主义的界限,将独立性绝对化了,将自己带有情绪化的主观臆断当作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东西,加以神圣化。同样地,对于苏联的经验,亦采取另一种非理性的态度,盲目地加以排斥。因此,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已经不是一种解放,反而成为一种包袱了,“自己的”不再有利于探索,反倒使这种探索受到了各种限制,同时,它还助长了否定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

在此基础上,1958年5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作了公开检讨。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极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速度,强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不顾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的高速度,便是其核心。

为达到高速度,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大大超过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高指标,工业指标普遍提高了一倍,农业方面提高20—50%。毛泽东提出7年赶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议认为,“只要鼓足6亿人民的干劲,动员6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为追求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3、5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在1958年入夏以后,出现了竞放“卫星”的浮夸风,各地报刊大肆宣传,粮食“亩产”迅速攀升至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这些离奇的“高产”得到鼓励,《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些高级领导人著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亦有著名科学家论证粮食高产的“科学依据”,浮夸风吹遍中国大地。

生产上的“高速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向所谓更高级形式的过渡。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将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问题,为会议所通过,于是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7月1日,陈伯达发表《全新的社